

# 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問題意識與貢獻\*

鄭阿財

## 一、前言

敦煌文獻的發現震鑠古今，變文公諸於世，立即引起相關學者的矚目，近百年來，變文研究更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成果豐碩。除敘錄、校錄文獻，或利用變文作為語料的語言學研究外，主要是變文名義、起源、體制及其與佛教關係等探究。

相較於敦煌學研究其他領域的表現，日本變文研究似乎不如佛教、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法制、社會、藝術等方面來得顯著而出色。雖然如此，其有關敦煌變文的研究面向與成果也有一定參考價值與影響。據本人近期編纂的《敦煌變文研究論著目錄》初稿統計，日本學者之研究篇章，總計近 300 篇。

日本學者較早關注敦煌文獻，對變文研究的面向也廣，尤其在變文與佛教、圖像關係等相關論題上呈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其中研究觀點、研究方法與經驗頗有值得借鑑之處。本人近年執行科技部『敦煌變文研究論爭之析論與平議』研究計畫，特關注相關情況，今應邀參加『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京都 2015』盛會，乃就個人多年來蒐集所得日本學者有關敦煌變文研究的論著篇章，分別從分期、主題，研究學者群、研究論題與問題意識等面向，考察其發展歷程，析論其特色與貢獻，正視其「問題意識」，以供變文研究發展之參考。

## 二、日本敦煌變文研究主題的計量分析

變文自來有廣義與狹義之別，本論文採取的是廣義的變文概念與範疇。首先參酌日本敦煌學研究發展的分期，將日本敦煌變文研究分四期來進行分析討論。

第一期，為 1945 年二次大戰前，屬萌芽階段。此期計有 16 篇論著。由於日本最早關注敦煌文獻的狩野直喜（1868-1947）主要專長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對俗文學

---

\*計畫編號：102-2410-H-343-011-MY2，執行期限：2013.08.01-2015.07.31。

多所重視；因此在敦煌文獻的考察中，對俗文學寫本尤為留意。1916年分別在《藝文》第7卷1號和3號發表了〈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的長篇論文，從英、法藏敦煌寫本爬梳出〈唐太宗入冥記〉、〈秋胡戲妻故事〉、〈伍子胥小說〉、〈孝子董永傳〉、〈季布歌〉等俗文學資料，據以追溯其在中國俗文學的發展。這是日本第一篇有關變文研究的論文，也是敦煌變文研究的發軔。之後，倉石武四郎（1897-1975）、青木正兒（1887-1964）對於〈目連變文〉的介紹，塩谷溫（1878-1962）對〈茶酒論〉的關注，川口久雄（1910-1993）對〈伍子胥變文〉和日本說話文學關係之探討等，對當時公布的變文寫本多所關注。遊學歐洲的那波利貞（1890-1970）在利用敦煌文獻探究唐代社會文化的同時，也發表〈韓朋賦考〉、〈中唐時代俗講僧文淑法師釋疑〉、〈晚唐時代の撰述と考察せらるる茶に關する通俗的滑稽文學作品〉等論文，均對變文的關注面向較為寬闊。澤田瑞穗（1912-2001）1939年發表《支那佛教唱導文學の生成》長文，探討唱導文學及寺院文藝唱歌與說話等基礎樣式，論述唐代俗講與變文、變文與變相等佛教講經演藝化，並從唐代變文、宋代說經派流到後期諸宮調、彈詞、鼓詞、道情、寶卷等關係。

此期研究學者大多能有機緣看到變文的原卷文本，因此，研究的面向與議題相對的寬且深，對敦煌變文的研究發展具開創之功。

第二期，為1946年二戰後至1980年，屬發展階段。此階段長達35年。1946年到1950年二戰剛結束期間，經濟蕭條，百廢待興，完全沒有論文發表，從1951年到1980年的30年間計有124篇。此期124篇研究篇章中，以涉及變文名稱、起源、講唱形式、變文概論、變文與變相、變文與繪畫關係等通論性論文38篇佔最多；其次是佛教故事的變文26篇，以〈降魔變文〉、〈破魔變〉、〈八相成道變〉、〈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目連救母變文〉為主；再次為講史性變文研究20篇，涉及〈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舜子至孝變文〉、〈董永變〉、〈王陵變〉、〈李陵變〉等，其中金岡照光（1930-1991）及川口久雄為主體，川口系列論文以變文與日本說話文學比較為主，頗具特色。再其次是押座文、講經文類的18篇，其中平野顯照（1928-2012）對於講經文與佛教經疏關係的研究最為系統而深入，金岡照光對於押座文有細緻而全面的整理與研究。其他則是針對個別講經文作品的考究。

此外，敦煌俗賦5篇，主要是〈茶酒論〉的考述；有關變文材料《搜神記》一類的小說研究有5篇，以及書評5篇。

這一時期立基於二戰前的基礎，隨著敦煌變文文獻的大量公布，不論在講唱文學、變文理論的溯源派流，或個別文本的微觀研究，或平行、影響等宏觀的比較研究，或講經文與佛教經疏關係，或講史變文題材探索等等，研究觀念與研究方法上均有所進展，成果也多有可觀。

第三期，為1981到2000年，面向寬，論題深，屬興盛階段。此期71篇研究中，

以金岡照光的 10 篇為最多，依次為金文京 8 篇，川口久雄 7 篇，遊佐昇 5 篇，川崎ミチコ、荒見泰史、砂岡和子各 4 篇為主。

金岡照光的研究面向全面而豐富，惜不幸於 1991 年逝世。正值壯年。金文京主要從中國古代小說、戲劇及說唱文學史的角度切入，進行敦煌變文故事主題的研究；川口久雄主要進行變文與日本文學的比較研究。其有關變文研究論文的結集則呈現在《敦煌よりの風》六冊中；遊佐昇、川崎ミチコ、荒見泰史三位分別關注變文中的〈葉淨能詩〉及其道教題材，〈茶酒論〉，以及〈醜女緣起〉〈地獄變文〉等敦煌佛教說話之研究。有關以變文為語料的語法研究則集中在砂岡和子及玄幸子的表現。

第四期，為 2001 至 2014 年，屬轉型階段。此期有 81 篇，由於此時中日交流頻繁，有十幾篇係出自中國學者訪問研究與研究生留學發表的篇章，實際上日本學者的論著約 70 篇，分佈在 21 位作者。雖然如此，但 1991 年起金岡照光、川口久雄、入矢義高等極具特色的研究者、領導者的先後仙逝，對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發展，是極為嚴重的打擊與影響。高田時雄意識到日本敦煌學研究隊伍逐漸老化的危機，其遠慮不無道理。

此期作者大多屬於中青年學者，其中以荒見泰史的研究最見成果，計有 23 篇，論題集中在佛教講經法會與變文寫本的形成。玄幸子 5 篇以佛教變文的文本校理為主；牧野和夫 4 篇全集中在《孔子項託相問書》的相關研究；伊藤美重子 3 篇以講史變文的研究為主…等，新秀高井龍在荒見泰史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敦煌講唱體文獻的生成與發展研究』，發表了〈「金剛醜女緣」寫本基礎研究〉等 4 篇論文，在擔心青黃不接的氛圍下是可喜的。

### 三、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群析論

2014 年 12 月以前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篇章粗略統計有 292 篇，分屬 90 位學者，其中有 11 位是來自中國及台灣的訪問學者或留學生。就個人發表的篇章數論，20 篇以上有三位，分別是：金岡照光 38 篇、川口久雄 30 篇、荒見泰史 28 篇；5-10 篇有 12 位，分別是：金文京 10 篇、那波利貞 10 篇、玄幸子 8 篇、平野顯照 8 篇、福井文雅 6 篇、入矢義高 6 篇、遊佐昇 6 篇、澀谷譽一郎 6 篇、砂岡和子 5 篇、秋山光 5 篇、小川陽一 5 篇、小南一郎 5 篇；4 篇的有：川崎ミチコ、牧野和夫、伊藤美重子、高井龍等 4 位；3 篇的分別有：澤田瑞穗、道端良秀、西野貞治、岩本裕、北村茂樹、根本誠、山田勝久、新井慧譽、橘千早、柿市里子等 10 位；2 篇的則有：狩野直喜、青木正兒、藤枝晃、松尾良樹…等 12 位；1 篇的有：塩谷溫、小川環樹、宮次男、岡野誠…等 38 位。

總計有 79 位，研究隊伍可說相當可觀。其中，狩野直喜是日本最早從事敦煌學

研究者之一，也是最早的變文研究者。其《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的長文，是介紹他歐洲訪書從英、法所藏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秋胡戲妻故事》、《伍子胥小說》、《孝子董永傳》、《季布歌》等，據以追溯中國俗文學之發展，勾勒出中國俗文學史的完整輪廓，既是日本第一篇有關敦煌變文的研究論文，也是敦煌俗文學研究的發軔。

研究成果最多的首推金岡照光。他是利用敦煌文獻研究中國中世俗文學的先驅。1953年畢業於東洋大學文學部。1961年以《敦煌出土唐五代變文的研究》獲文學博士。1969-1971年利用英國博物館和日本東洋文庫合作拍攝的英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縮微膠卷，及已公開的斯坦因等收藏目錄進行敦煌文學文獻的編目及解題，出版《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其專研敦煌文學，尤其以敦煌變文的整理與研究最為稱著。

金岡氏是日本敦煌變文研究最為專注且持久的學者，其研究成果質量可觀，變文目錄編纂，或理論建構，均有建樹。1954年開始撰寫第一篇有關敦煌變文研究的論文〈唐五代變文の意義——佛教の中國的展開の一断面〉，到1990年生前最後寫稿、組稿的一部專書《講座敦煌9・敦煌の文學文獻》為止，共編寫4部有關敦煌變文研究的專著，38篇有關敦煌變文研究論文。同時也是第一個系統性討論敦煌變文，從事變文文獻敘錄分類與理論基礎研究之學者。

他在變文研究上最具影響力的《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敦煌の文學》及《講座敦煌9・敦煌の文學文獻》等三部專著，是敦煌文學研究者必備之工具書。其他重要的研究篇章主要收入2000年出版的《敦煌文獻と中國文學》一書<sup>1</sup>。

變文研究篇章第二多的則為川口久雄。其研究領域為中國與日本比較文學研究。自1955撰寫〈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楚滅漢興王陵變・蘇武李陵執別詞とわか戦記文學〉以來，陸續發表有關敦煌變文與日本說話文學、古代文學關係的相關論文，包括佛教變文、講史變文等，至1983年〈敦煌出土の「俗講儀式」と略出因緣諸本——我が國說話文學とのかかわり〉為止，計有30篇。

相較於各國的敦煌變文研究，川口久雄的研究可說是獨一無二的，他將日本中世漢文學，特別是平安文學與敦煌變文相結合，進行互證互釋，充分發揮比較文學平行研究、影響研究與主題學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也成為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既探究了中世漢文學在日本的發展，又開闊了敦煌變文研究的視野。其論著篇章均收入1999年明治書院出版的《敦煌よりの風》6卷中。

變文研究論著第三多的是荒見泰史（1965-）。1985年進入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師從金岡照光教授學習敦煌文學，第一篇論文〈敦煌出土文獻〈地獄變文〉考略〉發表在《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2001年獲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

<sup>1</sup>見金岡照光《敦煌文獻と中國文學》，東京，五曜書房，2000.10。

2003年，進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後進修。現為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教授。其博士論文《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主要探討變文特有的文體及散韻相兼講唱體的演變過程。通過對敦煌原件資料的重新發掘、整理和校錄，明確了敦煌的講唱體作品是以佛教講經儀式為主要背景而成立的；其深入研究寫本抄寫情況等細節部分，進一步提出講唱體變文是在當時佛教通俗講經儀式的場合中，把各項儀式所用的文體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通俗文學作品。

《敦煌講唱文學文獻寫本的研究》為其博士後出站報告，通過對敦煌講唱文學文獻寫本不同異本的比較研究，探討了敦煌講唱文學作品的發展演變過程，有許多新的見解。由於年富春秋，專注研究，寫作力旺盛，加以家族背景，對佛教法會與佛教講經變文之關係尤其投入，乃至對於日本唱導文學、佛教說話文學之研究，多所用力。其研究以變文研究為基礎，佛教變文與講史變文兼具，從微觀的個論到宏觀的綜論，同時也關注變文在法會的位置與功能。師承金岡照光變文研究之方法，又兼融復旦陳允吉唐代佛教文學研究與浙大張涌泉敦煌文獻學研究之特色，提升其於變文研究的深度與高度。

此外，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進路也有其開創之功，即在變文內緣的文學研究之外，有將變文視為語料進行語法、詞彙的外緣研究，其中以入矢義高為代表，雖然其論著篇章不多，但影響卻不可小覷。入矢義高(1910-1998)是知名的中國語學和中國文學研究家。1936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1974年從京都大學退休，同年任花園大學教授，主持『敦煌變文研究會』。1998年辭世。其有關敦煌變文研究的篇章雖然只有6篇，然而主要奠基在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基礎與專長上。對變文詞語的重視可從其編纂《『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一書及對蔣鴻禮《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的書評中窺知。其在『敦煌變文研究會』的成立與運作，既推動了敦煌變文整理研究的進展，也掀起漢語口語白話研究的風潮，更培養了不少中堅學者，如松尾良樹、金文京、衣川賢次、玄幸子…等。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特別屬於俗文學的敦煌變文，其所使用的語言屬民間口語白話的俗語言，作品呈現的思想內涵是民間的俗文化，與一般傳統士人文學有別。尤其是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的敦煌，其文學的表現尤具地方色彩與歷史特質。因此，研究上宜針對這些特點廣泛吸取歷史、社會、文化等學科的相關知識，進行整合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變文進行歷史學的考察，發掘有關歷史的資料，綜合唐代社會民俗資料進行研究，成果必有可觀。那波利貞(1890-1970)便是跨學科研究的先行者。他在中國中古社會文化、經濟及法制史上著作宏富，擅於在傳世的史料外結合敦煌文獻，為唐代禮制研究、敦煌寺院經濟研究帶來新的視野與課題。1931到1933赴法國進修，對伯希和所獲敦煌卷子進行調查、抄錄、拍照並編目。回國後發表大批論文，主要利用敦煌文獻進行社會史及經濟史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敦煌文

學的研究，先後發表了〈韓朋賦考〉、〈中晚唐五代の佛教寺院の俗講の座に於ける變文の演出方法に就きて〉、〈晚唐時代の撰述と考察せらるる茶に關する通俗的滑稽文學作品〉、〈敦煌發現古寫錄本唐の鄉貢進士王敷撰の茶酒論の研究〉均具特色，這些論文篇章均收入弟子們編成的《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

變文源於佛教，是佛教弘法宣傳下的產物，蓋以佛教東傳，初期的傳播者主要是外來的高僧，傳播的方式，憑藉記憶口誦經典，進而訴諸于文字譯出經典，使信眾有可誦習之憑藉；經典流通與盛行，更透過注解、講說、圖像展示，進行教義的宣揚與教法的弘傳，快速的推動信仰的發展。佛教的傳播逐漸進入由雅而俗的新階段。大型法會訴諸語言聲音的轉經誦經與說法佈道；民間村落法邑經幢鐫刻等造經活動，訴諸於視覺的造像與繪製壁畫等圖像的傳播，使各階層與不同地域的信眾，得以有緣接受。期間主要的傳播者當然是僧人。

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特點之一更凸顯了僧人的關切。研究者中頗多具有佛教僧人身份的，其研究的關注點與切入點，尤其聚焦在講經儀式、講經分工與職能、講經的道具…，與佛教法會實際運作與功能的探究等。如平野顯照、福井文雅…都是其中的翹楚。福井文雅（1934-），是日本佛教學者，中國學者，天台宗僧侶。歷任早稻田大學教授、大正大學講師、日光山輪王寺唯心院住持。主要著作有：《般若心經の歴史的研究》、《道教研究のすすめ》《佛教的東漸與道教》、與牧田諦亮合編《講座敦煌》第七卷《敦煌與中國佛教》…等。有關變文研究主要有〈講經儀式における服具の儀禮的意味〉、〈講經儀式的組織内容〉、〈俗講の意味について——ドミエヴィル先生に捧ぐ〉、〈都講の職能と起源——中國、インド交渉の一接點〉、〈唐代の俗講形式の起源〉、〈唐代俗講儀式的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等篇章，對於俗講的實務研究有獨到的見解。

變文與變相之產生均源自佛教，同為佛教傳播過程中的宣傳手法，一是將經文內容變更為：以線條、色彩、形相表現的視覺圖像；一是以通俗語言、韻散交雜形式表現的聽覺講唱，共同達到宣傳佛理，教化俗眾的目的。二者同樣可省稱為「變」。日本佛教美術學者，秋山光和（1918-2009）早就關注變文與繪畫的關係。前後發表5篇頗具見解的篇章。他194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美術史學科，1965年參加《世界美術系》第九卷《中國美術II》（敦煌石窟與它的壁畫）編纂。編著有《日本繪卷物の研究》、《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等。有關變文研究主要有：〈敦煌における變文と繪畫——再び牢度叉鬪聖變（降魔變）を中心に〉、〈敦煌における變文と繪解〉、〈敦煌本降魔變（牢度叉鬪聖變）畫卷について〉、〈變文と繪解きの研究——平安時代世俗畫の研究〉、〈變文と繪卷——ペリオ將來降魔變圖卷について〉等，為變文與繪卷關係研究打下厚實的基礎。

從小說及民間故事研究進路，進行變文研究的，主要為金文京（1952-），計發

表相關論文 10 篇。金氏為朝鮮裔日本人，1974 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中國文學科；1974 年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修士課程，完成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中國語學文學科博士課程，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韓國成均館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戲劇及說唱文學史研究。有關變文的研究主要有：〈王昭君變文考〉、〈中國の語り物文學——說唱文學〉、敦煌本〈舜子至孝變文〉と廣西壯族師公戲〈舜兒〉、〈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變）》考〉、〈敦煌變文の文體〉、〈孔子的傳說——〈孔子項託相問書〉考〉…等，頗能結合小說、戲曲材料進行變文主題的研究，為其特點。

唐代三教並行，除佛教講經外，儒家、道教也有講經。敦煌變文的發現，有關佛教俗講的問題，才受到學界的矚目。由於敦煌為佛教聖地，發現寫卷的莫高窟藏經洞是佛教洞窟，今存敦煌變文，主要為佛教講經文、講唱佛教故事及中國民間歷史故事等變文。有關道教的講經與變文，相對少有論及。1941 年道端良秀有〈道教の俗講に就いて〉一文，1960 年小川陽一有〈《葉淨能詩》の成立について〉，之後則尠有論述。金岡照光的弟子遊佐昇對道教變文則有所用心，1983 年發表〈葉法善と葉淨能——唐代道教の一側面〉後，陸續有〈道教と唱導——BD1219 文書の検討から〉、〈敦煌俗文學と道教〉、〈《董永變文》和道教-以董仲信仰為中心探討〉…等研究篇章，成為少數研究敦煌道教變文的主力。

#### 四、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論題與問題意識

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成果，根據個人近期編纂的《敦煌變文研究論著目錄》初稿，總計有 292 篇，參考拙編分為：『通論』、『校注』、『語言』、『講經文』、『佛教變文』、『講史變文』、『小說』、『俗賦』、『書評』等九類來進行計量分析與解說。其中，『通論』有 89 篇，『佛教變文』58 篇，『講史變文』56 篇，『押座文、講經文』28 篇，『語言』、『俗賦』各 15 篇，『小說』13 篇，『校注』10 篇，『書評』8 篇。

『通論』89 篇最多，蓋以敦煌變文絕世已久，一旦公諸於世，自然引起矚目，成為中國俗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加以傳世典籍尠有記述，因此對於變文的名義、起源、體制及其與佛教關係的探究，當是研究者最關切的議題，討論自然熱烈。『佛教變文』58 篇，『講史變文』56 篇，二者不相上下，呈現佛教故事題材變文與中國史傳及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同受研究者青睞；又反應敦煌佛教變文作品篇數與講史變文不相上下的實際狀況。『押座文、講經文』28 篇，說明日本學界關注敦煌講經文與佛教義疏關係及講經文體制分析的情況。

除了以上論題的觀察外，從篇章所研究的問題焦點來考察，大致歸納出：『變文名稱、起源』、『變相與變文』、『變文與繪解』、『校注、校勘』、『口語詞彙與語音文

法』、『變文與日本文學』、『唱導』、『俗講』、『講經文』、『說唱文學形式』、『俗文學』、『俗文化信仰』、『故事研究：佛教故事』、『故事研究：史傳故事』、『故事研究：俗賦』、『小說』、『文本研究』、『書評與研究動態』幾類。

在以上所歸納的諸多議題中，頗多屬於研究敦煌變文者所共同關心討論的議題，如『變文名稱、起源』、『變相與變文』、『校注、校勘』、『說唱文學形式』、『俗文學』、『故事研究：佛教故事』、『故事研究：史傳故事』、『故事研究：俗賦』…等，無須特別說明。不過，有幾個議題則是日本變文研究較具『問題意識』特色的，茲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變文與繪解』的問題意識。變文與變相均源自佛教，二者關係的聯繫主要在「變」這一共同的特性。變是佛教傳播過程中的的一種宣傳手法，是將經文內容變更為：線條、色彩、形相表現的視覺圖像；或以通俗語言、韻散交結形式表現的聽覺講唱，達到宣傳佛理，教化俗眾的目的。二者同樣可省稱為「變」。隨著時間推移與發展，講唱變文時，不論佛教或非佛教，均可有變相圖畫的配合；而在變文盛行下，許多膾炙人口的題材也被採入寺院壁畫的繪製，甚至有以變文作為繪製壁畫之題材藍本。因此自來研究者多著眼於變文與變相關係的研究。

在日本有所謂的「繪解」，它是類似唐代俗講變文中，用以搭配吟誦說唱的配圖，內容大抵為宣講佛經與佛傳故事。隨著佛教的傳入，這種傳達佛教教義的媒介，從平安時期便廣為流行，之後更由弘法佈道發展為寺廟神社宣傳，或對祖先報恩謝德，或為祈福供奉，甚至單純的欣賞，因而繪卷內容也大為擴展，而有：經說類、和歌類、物語類、戰記類、說話類、記錄類、傳記類、緣起驗記類、御伽草子類、雜類等，是日本的重要特色文化之一，其傳承主要在佛教的唱導之中。敦煌文獻P. 4524《降魔變》是唐代講唱時使用的實物遺存。日本大量的繪解，至今仍在各種唱導活動中普遍使用，2014年3月『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時，大會特地安排日本真教寺馬川透流進行「蓮如上人繪傳」繪解的實際演出。早在1955年梅津次郎便發表有〈變と變文——繪解の繪畫史的考察その二〉<sup>2</sup>，之後，川口久雄有〈敦煌變文の性格と日本文學——繪解きの世界〉<sup>3</sup>、金岡照光也有〈變と變文——敦煌の繪解き〉<sup>4</sup>，秋山光和更出版了《變文と繪解きの研究—平安時代世俗畫の研究》專著<sup>5</sup>。這無疑提供了變文與變相鮮活的實證，讓人可具體的理解變文講唱時搭配視覺輔助畫面進行的情況，當屬日本變文研究的重要貢獻。

『變文與日本文學』的問題意識。日本平安朝時期相當於中國中唐至南宋時期。

<sup>2</sup>梅津次郎〈變と變文——繪解の繪畫史的考察その二〉，《國華》750，1955，頁191-207。

<sup>3</sup>川口久雄〈敦煌變文の性格と日本文學——繪解きの世界〉，《日本文學》12：10，1963.10，頁27-41。

<sup>4</sup>金岡照光〈變と變文——敦煌の繪解き〉，《國文學》47：11，1982，頁53-60。

<sup>5</sup>秋山光和《變文と繪解きの研究—平安時代世俗畫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此時隨著中日交流遣唐使、學問僧引進了中土流行的各種時尚文學，影響日本平安朝的文學。中國傳奇、變文、說話等敘事文學，提供日本古代各類說話文學豐富的養分，使平安文學能在各個階層教育、娛樂乃至宗教信仰中發揮正面的功能。時至今日我們卻可憑藉平安時期的說話文學來與敦煌變文故事題材相互參照，使敦煌變文研究能夠在「以唐考敦，以敦證唐」的同時，更多了許多寶貴輔證。這一點日本學者也早提出了此類問題意識。特別是平安文學專家川口久雄，他自 1955 年起先後發表有〈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楚滅漢興王陵變・蘇武李陵執別詞とわが戰記文學〉<sup>6</sup>、〈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目連救母變文、降魔變文〉、〈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王昭君變文と我が國における王昭說話〉…等系列論文，都是圍繞在敦煌變文與日本古典文學關係上，成就他國無法取代的特色與貢獻。

『俗講與唱導文學』的問題意識。在向達探索敦煌變文的起源，發表〈唐代俗講考〉提出「俗講文學」的前後，日本佛教文學研究者筑土鈴寬（1901-1947）提出了「唱導文藝」一詞<sup>7</sup>；民俗學、國文學者折口信夫（1887-1953）則提出了「唱導文學」一詞<sup>8</sup>。澤田瑞穗受到啟發，於 1939 年發表了《支那佛教唱導文學の生成》一文<sup>9</sup>，既深受向達的影響，又繼承折口信夫所提出的「唱導文學」術語與觀念，用以探究唐代俗講與變文、變文與變相等佛教講經演藝化，及變文的淵源流別等問題。隨著「唱導文學」一詞的提出，使其研究範圍更形凝聚，且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門區塊。日本變文研究者開始有以「唱導文學」來繫聯敦煌變文展開研究而發為論文的，如：川口久雄對變文的性格與日本唱導文學的比較，說明日本唱導中說話與說經師的關係<sup>10</sup>。近年荒見泰史更嘗試以「唱導文學」概念來進行敦煌文學的研究，希望能開拓出一條新的研究路徑，他先後發表了系列論文<sup>11</sup>，嘗試以「唱導文學」的概念來囊括演變成敦煌講唱文學之前的那些周邊資料。

『作為變文材料的小說』，敦煌變文的研究者，普遍對於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及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將《搜神記》、《孝子傳》二篇收入變文集，頗不以

<sup>6</sup>川口久雄〈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楚滅漢興王陵變・蘇武李陵執別詞とわが戰記文學〉，《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篇）》3，1955.12，頁 16—30。

<sup>7</sup>筑土鈴寬：〈唱導文藝としての百座法談〉，《文學》（講座附錄），1932.7；收入《筑土鈴寬著作集》第 3 卷，せりか書房，1976，頁 255-270。

<sup>8</sup>折口信夫：〈唱導文學——序説として〉，「日本文學講座 第二卷」改造社，1934.8，後收入《折口信夫全集》4，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5。

<sup>9</sup>澤田瑞穗《支那佛教唱導文學の生成》，《智山學報》13、14，1939-40。修訂後改題《唱導文學の生成》，收入《佛教と中國文學》一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5，頁 1-66。

<sup>10</sup>川口久雄〈敦煌變文の性格とわが國唱導文學——說話と說經師の系譜〉，《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編）8 號，1961.4，頁 1-20；〈題畫文學と唱導文學〉，《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篇）19，1972. 3，頁 1-17。

<sup>11</sup>12 荒見泰史〈敦煌文獻與「唱導文學」〉，《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12，頁 403-410；〈敦煌的唱導文學文獻——以《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為中心探討〉，《項楚先生欣開八秩頌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8，頁 48-61。

為然，以為《搜神記》、《孝子傳》當是小說，不該視為變文，宜將之從變文集中與予剔除。王重民及潘先生當然知道此二書是小說，只是他們在理解變文題材與編寫實況後，以為《搜神記》、《孝子傳》雖是小說，卻是變文講唱寫作的素材，因此特將之安置在變文集的最後一卷。關於這一觀點，日本敦煌變文的研究者，瞭然於心，所以非常重視變文寫作材料的相關問題。西野貞治、川口久雄等有關《搜神記》的探究<sup>12</sup>；枅尾武、高橋稔、湯谷祐三等有關《孝子傳》的論文<sup>13</sup>…，都具有此一問題意識。

除此之外，近期日本敦煌變文的研究，也留意到透過變文來進行『俗文化』、『俗信仰』的考察，或從說唱文學的功能性進行探究，為百年的敦煌變文研究，開拓新的視野。如伊藤美重子〈敦煌寫本「伍子胥變文」について：その娛樂性〉<sup>14</sup>，遊佐昇〈《董永變文》和道教——以董仲信仰為中心探討〉<sup>15</sup>…等。

## 五、日本敦煌變文研究的特色與貢獻

敦煌變文研究，在中國主要表現在文獻校輯上，其文本研究則在校錄的基礎上以俗文學的方法進行探源溯流。日本的敦煌變文研究，整體而言，不論對變文名義，或變文起源，或變文講唱形式、文體與源流，乃至變文與變相之關係，均做出了全面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

尤其 80 年代以前，研究成果頗受學界肯定。日本學界對中國學者在敦煌變文研究上的協助與啟發，有一定的影響力，也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特別是入矢義高在漢語語言學的基礎上對敦煌變文俗語詞進行的研究；川口久雄將敦煌變文與日本平安文學相互聯繫，展開比較研究；金岡照光最早對敦煌變文進行文獻編目與作品分類，並展開全面概述，發表系列有關變文的研究論文；撰寫專書，系統總結敦煌文學研究成果。

相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日本敦煌學的研究最明顯的特色便是專一而獨特。上述

<sup>12</sup>西野貞治〈敦煌本《搜神記》について〉，《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書誌學論集》，東京：平凡社，1957.11，頁 437-449；西野貞治〈敦煌本《搜神記》の說話について〉，《人文研究》8：4，1959.4，頁 56-67；川口久雄〈日本說話文學と外國文學とのかわり——敦煌本搜神記をめぐる〉，《國文學解釋と鑑賞》30：2，1965.2，頁 59-63。

<sup>13</sup>枅尾武〈敦煌變文孝子傳と舜子變の比較〉，《櫻美林大學中國文學論叢》1968.3，頁 89-10；高橋稔〈敦煌本孝子傳覚え書〉，《東京學藝大學人文科紀要》35，1984.2，頁 179-18；湯谷祐三〈新出敦煌孝子傳資料と變文の關係——羽田記念館所藏《西域文獻資料寫真》所收孝子傳資料をめぐる〉，《同朋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23，2003，頁 87-104。

<sup>14</sup>伊藤美重子〈敦煌寫本「伍子胥變文」について：その娛樂性〉，《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31，2012.4，頁 25-40。

<sup>15</sup>遊佐昇〈《董永變文》和道教——以董仲信仰為中心探討〉，收入《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冊，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

的幾位學者，其專精一意之精神令人讚嘆，幾乎都是窮一生之精力於某一論題之鑽研，從材料蒐集到理論的建構，由單點的突破到系統的論述。

研究者務求專一而不駁雜，充分呈現敬業精神。如福井文雅的研究，論題絲毫不逾越其專業的研究領域，篇篇結合自己有關佛教講經的學養與專長。無論是講經的形式、儀式、道具均基於其嫻熟的佛教事務，因此每有獨到見解。

川口久雄以其日本中世漢文學的專長，與深厚的平安文學學養，結合敦煌變文文獻，發為論文，至為可觀。其所論述，資料豐富，證佐有據，而跨學科、跨領域的比較文學研究，更是令吾輩刮目相看。

學術背景影響關注的學科，學術專長也引導研究主題的選擇，更關係到學術發展的面向與成果的呈現。臺灣敦煌變文的研究者頗多皈依或親近佛法，於佛教文化多所理解，對敦煌佛教文獻、文學與文化之研究與關注尤為深切，因此不自覺的形成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的優勢與趨向。日本在這方面則更具特色，有許多的研究者不但親近佛教，更具有僧侶身份，且有寺院道場主持或參與佛教法務的實際經驗，因此關注變文與法事之關係，析論變文在唱導與俗講活動的功能等等，尤其深入且切近。加上日本佛教教團主辦的大學眾多，如大谷大學、龍谷大學、駒澤大學、佛教大學、大正大學…等，也關注敦煌變文的研究，這都是日本敦煌變文研究重要的助力。

又日本唐化運動以來，大量唐抄本、古寫本、正倉院豐富的大唐文物及平安時期的文獻、寺院文書，提供了敦煌變文印證的相關資料與實物。加上日本佛教法會講經與唱導活動的實務，說唱藝人、繪解與唱導文學在各個場合的運用等等，大大提高了唐代變文講唱活動現場重建與活化的可能性；使敦煌變文研究在紙面材料外，又有實物材料與民俗材料等多重證據可資論述。

（作者為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長江學者講座教授）